

翻譯文章

自我毀滅的秘密武器？ 統合主義對統一戰線的制度性侷限

作者：Gerry Groot

(澳洲阿德雷德大學亞洲研究系中國研究高級講師)

譯者：林鈺鈴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際研究英語學程碩士生)

原文：Groot, Gerry. 2012. "A self-defeating secret weapon? The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f corporatism on United Front work." In Jennifer Y.J. Hsu and Reza Hasmath, eds., *The Chinese Corporatist State*, pp. 47-67. New York: Routledge.

摘要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統戰工作」早在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擊潰國民黨後已經完結。事實是，「統戰工作」遠不只是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的統合，還包括許多政治團體、海外華人、宗教信仰者等等工作。一些少數政党和團體（如民主黨派）更在孤立國民黨的統戰策略中發揮著重要角色。在往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1950~1956），這些被中共以統一戰線所認證的所謂民主黨派，在幫助與舒緩這一劇烈轉變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民主黨派被中共影響與民主黨派對此的怨懣在1956~1957年的「雙百運動」中被釋放出來，但因為中國正在廢除私有財產與階級，這些問題都變得不再重要。之後民主黨派也支持著1970年代晚期所開展的經濟改革，而當今中國社會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也積累了更多新的社經團體，故統戰部門和民主黨派也被要求去代表和聯合這些新團體，從而保衛中共的領導權、並同時促進發展與統一。本文認為那些在1950年代面對的問題仍然存續至今、而且似乎更為加劇，因為中共在選擇合作對象上的過度控制，使得這些團體並不能夠準確地代表新社會團體的利益。推斷

這些系統性問題，也有助於解釋統戰部門在預防其他的問題上、例如宗教信仰者和少數民族騷動上能力的缺失。

關鍵詞：統戰工作、統合主義、系統性限制、宗教與少數民族人士

* * *

近年來，數起顯著的族群動亂事件已對中國社會造成動盪，如 2008 年的西藏騷亂和 2009 年之新疆叛亂。儘管不同宗教團體之間—以 1999 年之法輪功團體最為人知—的衝突與摩擦較少受到關注，其意義仍十分重要。這些衝突事件之成因和性質雖然各自迥異，然而衝突事件之崛起可部分歸因於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共產黨），以統合主義作為其統一戰線接觸、代表、甚至影響宗教團體和少數族群的手段之一的制度性局限，這些限制降低了代議團體（representatives）判斷其所屬團體的感受與問題的能力，並削弱向上傳遞訊息的準確度。

早在 1939 年統一戰線策略確立之初，毛澤東將統一戰線同黨的建設和武裝鬥爭，列為共產黨之三大法寶（Mao 1967[1939], 286）。統一戰線工作部（以下簡稱統戰部）本質上屬於政黨組織（Party），並非政治組織，其任務乃贏取黨外非「自然」（natural）選區的工人與農民團體的支持，以號召對黨的政策與工作之認同，對抗共同敵人。然而，1949 年沿統合主義路線，將統一戰線正式實體制度化後，衍生出看似系統性的問題弊端，這些弊端讓共產黨在 1949 年到 1960 年代之間深受其惠，原因在於毛澤東急於藉由廢除私有權（private ownership），消弭階級、宗教、甚至族群差異，以發展社會主義。

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朝向經濟成長和社會多元主義發展，導致新社會階層（new classes）和利益團體的崛起、宗教復興、以及新一波族群間緊張的現象。而統戰部經過重新整頓，回應來自新興團體的問題，和既有團體如宗教團體和少數民族捲土重來的挑戰。其中，統一戰線統合主義形式的制度性限制或許能說明，為何統戰部在聯合能夠確切反映言論和團體傾向的盟友時遭遇困難。再者，即便一時之選的盟友能夠反映所屬之利益團體，加入統一戰線後伴隨的條件與利益，將迅速深化其與所屬團體的鴻溝。因此，少數黨派與團體（MPGs，以下稱為民主黨派）整體將更難表達支持者的想法和公共意見；同樣地，宗教領袖亦無法反映其信眾的心聲而脫節，而族群領袖也有可能只為少數人發聲。

統一戰線的演變，因為涉及民主黨派，而道出其目標與結果之落差。相關討論指出，在統合主義的中介體（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與統一戰線宗旨相輔相

成的背景下，統一戰線在 1949 年後以統合主義形式制度化。綜觀統一戰線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目標移轉，彰顯出統一戰線的工作主軸，已逐漸轉變為處理日益複雜的社會多元主義問題。這項觀察指出統一戰線的當前目標與共產黨管控的中介效果（intermediary effects）相互抵觸，並以此結論解釋目前已知的統一戰線對宗教團體與少數民族的工作問題，然而如此解讀將使問題越發複雜，加深其盟友作為代議團體與所屬利益團體之間的鴻溝。這道鴻溝道盡統一戰線的盟友，作為線人（informants）傳遞訊息的缺失，同時顯示對倡導統一戰線作為協商民主，和有效替代西方民主的可能形式，就主要前提提出質疑的侷限（左憲民、李賀林 2008）。

壹、統一戰線概述

簡單來說，統一戰線之宗旨乃企圖聯合所有可能之盟友，為對抗共同敵人或共同目的而奮鬥，甚至短期遇有重大退讓，亦在所不辭。統一戰線，或人民戰線，在 20 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曾是重要的戰略和策略工具，用以贏取反對陣營的潛在支持，或者使之保持中立。共產黨起初受第三共產國際的支持，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採取上述手段，稱為聯俄容共（1924~1927）。聯俄容共允許新成立的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Nationalists），以下簡稱國民黨，而非國民革命軍（Revolutionary Guomindang，以下簡稱國民黨），該政策之目標乃試圖將第一次國共合作左傾，並轉型為共產主義運動（Elleman 1995）。然而，在蔣中正成為國民黨之領導人後，便企圖限縮共產黨於黨內之影響。1927 年 4 月，數千名共產黨黨員、左翼分子、和工會組織者（union organizers）慘遭清黨政策整肅——一場被形容為讓人聯想托洛斯基和史達林間政治鬥爭的巨大災難事件（Isaacs 1938）。共產黨雖於 1921 年甫正式成立，係一個由個人、小型知識團體、和潛在革命勢力組成的鬆散集合（Van den Ven 1991）。儘管仍有問題尚待解決，統一戰線仍催生富有經驗且獻身革命事業的積極分子，以握有和國民黨及其軍隊大量珍貴的人脈網絡感到自豪，而共產黨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兩大教訓，便是體認到組織獨立運作的需要，以及一支確保其安全的軍隊。

在日本企圖向外擴張至中國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於 1936 年成形，並在名義上持續至 1945 年。儘管國共合作之重要性再度受到蘇聯支持，該合作僅是統一戰線廣泛架構的一部分。藉由強化愛國主義的形象，以及對先前諸如地主和資產階級等階級敵人的妥協退讓，第二次國共合作實際上徵召所有可能協助共產黨

的團體，對抗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而最終目標便是消弭國民黨之合法權威（Van Slyke 1967）。來自政治光譜左右翼的許多小型政治團體、學術權威和非共產黨的抗爭者（non-communist activists），即使為數不多，均成為共產黨的鎖定對象。另外，1941 年國共實質分裂後，共產黨對於上述人士的吸收（cooptation）、滲透（infiltration）和操控仍持續進行。面臨日本侵略而急需統一中國陣線的政治壓力，道破蔣中正無法正式終止國共合作，或公開攻擊共產黨軍隊的勇氣，使共產黨在日後接續的國共內戰中，最終得以重建並整裝待發。城市的少數黨派及團體，或稱為民主黨派，是面臨日本侵略、國土存亡之際，號召國家團結的主要聲浪（Groot 2004）。

珍珠港事變後，共產黨調整其統一戰線工作，將贏得共產主義革命之勝利設定為目標。由於民主黨派向地下共產黨員提供城市庇護及與菁英商業人士、學生、作家和出版商之聯繫管道，而這些都是塑造公共言論和提供金援、物資、服務與技術的重要團體，使得民主黨派越發重要。這些受過教育的團體被視為模範榜樣，而他們的出版品亦成為主要形塑公共言論的影響來源，在國共兩極的意識形態之間表達不同意見立場（Groot 2004）。

直至第二次國共內戰前，共產黨著手擴大其地下黨員對主要城市的影響，如上海及北京，這些城市大部分被國民黨排除在外。共產黨除了加強對既有民主黨派的工作之外，開始鼓勵成立新團體，或創造代理人（proxies）代表不同利益團體，企圖呈現反國民黨聲量的多重性。多數的既有和新興團體若非受到共產黨的全然掌控，便是深受該黨的極大影響。這些民主黨派雖然看似獨立，卻一面呼籲民主，一面擁護共產黨之地位，批評其他民主黨派和國民黨的缺失。倘若國民黨當時真如美國所願般發起全國選舉，共產黨便能獲得大量的盟友，贏得更多城市選民支持的機會。

如果國民黨的行動和統一戰線的工作皆激發人們投向共產黨，那麼共產黨勢必將感到滿意；又倘若國民黨先前的認同人士（sympathizers）能放棄對黨的熱烈支持，態度轉為消極，同樣能使共產黨稱心如意。這股消極越是強烈，國民黨就越是虛弱、越是政治孤立。1947 年 10 月國民黨將民盟宣布為非法團體時，便象徵著國民黨越發孤立無援，以及共產黨日益壯大的合法性。多數民主黨派在 1948 年 5 月 1 日的協商會議中公開擁護共產黨，使之在鞏固共產黨對國家權力的掌控上，代表城市中產階級（urban bourgeoisie）扮演關鍵角色（Groot 2004）。這些民主黨派加入流亡（in exile）的共產黨，並在日後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這項新立法法案中，成為組成分子。該會議為最終的全國人民大會制度（以下簡稱人大）鋪路，並以人大

的諮詢實體自處，之後更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政協），成為統戰工作的終極代表組織。

共產黨擴大己營之關鍵在於包含重大政治退讓的複雜政策總和，如聲稱放棄激進的財產徵收制，改採租稅減免，並宣示欲奉行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On New Democracy）（Mao 1967[1939], 339-384）主張長期的階級共存和所有權形式，同時保證自由與民主。以培養友誼、施以恩情、提供財務或實際援助為手段，並強烈呼籲愛國主義和民主等利他精神，建構對關鍵人物、公開支持組織、累積會員、共產黨滲入和控制民主黨派等工作的廣泛網絡。所有對共產黨表示友好的團體，將在新的統一戰線制度中代表參與，從而更為民主。共產黨對長期階級共存和所有權形式的承諾，是為求地主、商人、廠主放心，且為防止倒向國民黨，所作的一大政治退讓（Hu 1994）。另外，因為各民主黨派往往來自接觸並力求代表不同社會階層，對中國政治社會和共產黨的發展貢獻良多。這些退讓與共存將「長期」持續，至少在共產黨培育自身專業人才之前，尚需要這些民主黨派的專業協助。

貳、民主黨派的統合化

當共產黨武力擊潰國民黨後，其統一戰線之目標便轉變為鞏固政權、經濟生產社會主義化，以及消弭建立在財產私有制的階級制度。其中關鍵的改變是民主黨派的有效轉型，成為代表特定利益團體的統合主義式組織。如前述章節中提到，Philippe Schmitter（1974, 97）將用於共產國家的形式，一元統合主義（monist corporatism）定義為：

一個代表利益的系統，當中的組成單元是：被組合進和配置為有限的數目、依據意識形態而被選擇、不存在競爭、功能存在差異、且有階層排列的分類，並透過單一政黨創造、援助和認證，且被該黨黨和相對應的國家授予代表角色，以換取某程度選擇自身領導層的控制、表達訴求和動員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Schmitter（1979, 65）在那之後調整對一元統合主義的論述，將之形容為利益中介（intermediation，即訊息的改變導致外部影響）系統，原因在

於該詞彙避免「代表」即是準確傳遞成員偏好的意義指涉。儘管如此，共產黨仍認為民主黨派確實體現特定團體，並於 1950 年的任何情況下，根本無從得知數十年後利益中介將演變為問題弊端。

在共產黨贏得勝利不久後，便開始吸收出逃的國民黨黨員，以及其他特別針對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官員所招募的成員。從這一層面來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了國民黨官員、幹部，以及所有與之相關的成員。在拒絕通過若干有關刑事和外事的團體後，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審查機制正式上路，並最終確認八個民主黨派。

民主黨派經過意識形態的篩選，其黨員必須接受共產黨領導和政治灌輸。那些期盼共產黨與國民黨妥協，或對支持所屬的民主黨派搖擺不定的黨員均被開除黨籍，反共產主義者根本無容身之處，唯有符合共產黨定義的「民主」元素方可加入。雖然仍存有異質，然最終將因政治教育而逐漸消除。

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在國民黨內部相當不明，其他黨派亦然。作為最大、亦是最重要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宣稱自身「是以知識分子，尤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做為主要組成的政治組織」（Groot 2004, 71），以大學畢業生和公務人員為主。

中國農工民主黨（以下簡稱農工黨），其前身為鄧演達（1895~1931 年）所領導的左翼革命第三黨，在喪失原本來自憤慨不平的共產黨員和左翼國民黨員的支持後，該黨轉為招募城市小資產階級，尤以公務人員為主，而最終專注於醫界人士的吸收。

九三學社則鎖定高水準的文化、教育與科學團體，並最終以代表科學家、學者、律師為主的民主黨派。該黨早期與農工黨的切割爭議，使之獲得來自西式醫界的挹注，而農工黨則相對得到中式醫界的援助，藉此，統戰部居中調解齟齬。

中國民主促進會原本以工、商業界為目標，重新定位後以學校老師、校長、作家、編輯等其他出版業界的人士為主。

中國民主建國會放眼於上海、北京以及天津的重要資產階級，形成以小型貿易商和工藝師為基礎的團體。

兩個成員最少的民主黨派則是最為專門的團體。首先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為滯留大陸地區的臺灣人士，或是國民黨占領臺灣後潛逃至臺灣的大陸人士的代表團體。另一個專門的民主黨派則是中國致公黨（以公共利益著稱），作為共產黨的公共顏面，接觸海外華僑，尤其是如洪門秘密或半秘密的團體。兩者皆在 1952 年結束黨員招募，並且在改革開放前鮮少被提及。

同樣具有顯著意義的是 1951 年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創立，該團體源於統一戰線長期自私人企業獲得重要援助與支持的目標工作，與中國民主建國會合作密切，導致兩者的領導階層和會議時程時常重疊。

唯有民盟、農工黨，或許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 1950 年以前的形式，享有某種程度的獨立。其餘的民主黨派皆是中央統戰部的特殊產物，用以挑撥國民黨，召集對共產運動的支持和宣稱對特定團體和階層的代表權。1950 年以後，所有民主黨派皆以布爾什維克的組織體制重新經過縝密設計，以民主集中制反映共產黨結構。共產黨藉由統戰部實行控制，影響領導階層的選派、會員的招募、組織目標和優先順序的設定，以及補助的支出，因而確立鮮明的層級制度。另外，共產黨針對民主黨派可招募的「進步派」人數（progressives）設有限額，這些進步派其實大多已是共產黨員，而許多組織員工亦身兼統戰部的幹部，幾乎絲毫不差的呈現 Schmitter 一元統合主義的標準。

參、民主黨派之角色

在共產黨眼裡，民主黨派應當解釋共產黨的需求，說服各自代表階層，接受並朝向共產黨目標努力，並樹立榜樣。儘管各階層持續共存一民主黨派因此被新民主正當化—共產黨的首要目標卻是轉化知識分子的思想，使之全力支持社會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首當其衝的是民主黨派的領導階層，再者是黨員，最後則是目標團體的所有人，皆須被迫改變思想。透過允許民主黨派代表不同階層，共產黨聲稱民主黨派的整合是其對民主的承諾之一，而民主黨派獲得的回饋便是表面上顯著的政府參與。三位全國副主席皆是名義上的無黨籍人士，而有十到十二席的政府部會首長職缺，被指派給民主黨派的領導階層。然而這些數字實乃言過其實，因為這些部會首長大多具有共產黨黨員的雙重黨籍（Groot 2004, 71-76）。

有關民主黨派領導階層的職務安排，幾乎在一開始便是問題重重。雖然周恩來總理堅持「黨際關係同黨內關係，需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32-33），但實際的職務派任僅屬名義和形式性質，真正的職務實權由共產黨籍的副部長掌握。儘管李維漢作為統戰部的部長，鼓吹透過給予盟友適當的職務安排、責任與發聲管道，與盟友積極協商，情況卻徒增惡化（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16）。除此之外，民主黨派亦面臨吸引潛在黨員的侷限，例如共產黨聘任更多民主黨派黨員的事實，確實在初期締造誘因，然在確保工作無虞後，該民主黨派

的黨籍也壽終正寢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員會 1991, 140）。

1956 年受共產黨的強烈要求，民主黨派和其支持者被迫改頭換面而嚴重受挫。自 1950 年起，共產黨發起一系列一致的意識形態改造運動。由於主要敵人的勢力被一一限縮，曾經被視為盟友對抗國民黨的民主黨派領袖，便成為共產黨眼中的右翼思想堡壘，遭到公開譴責與批鬥，被迫認錯並承諾改變其錯誤思想和基本價值觀，從民主黨派一路到大學、校園、工廠、辦公室無一倖免。共產黨黨員、共青團和進步派是改革過程中推動激烈思想的先鋒，而許多無法承受改造壓力的人因此走向輕生。對此，城市社會所反映的，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就只有越發被動地對待共產黨的運動。中國民主建國會創辦人、糧食部部長章乃器，批判「進步派所加諸在身為共產黨黨員氛圍可見與不可見的分離主義，噤聲那些欲躲避批判之人」（Hinton 1980, 506）。與其冒險招致政治抹黑，恐懼使多數人選擇視若無睹。

為改善共產黨內部問題、增加知識分子的熱誠、和增進民主黨派作為黨的渠道，毛澤東與共產黨為修正主義運動鋪路，即現今為衆人所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以下簡稱雙百運動）。毛澤東為求民主黨派放心，承諾「黨內外關係平等，非共產黨人士實際享有職務與職權。從現在開始，無論何處，在其位者享其權」（MacFarquhar et al. 1989, 140）。

統戰部因而著手構思全盤計畫，協助民主黨派參與共產黨之修正，改善統一戰線的問題。雙百運動的重要之處在於揭露民主黨派的任務與結構之間的矛盾，而該矛盾與時常纏身統戰部（民主黨派的實際控制者）的問題密不可分。比起其他共產黨部門，統戰部原則上缺乏資源，條件更為苛刻，因此在幹部徵才上面臨困難。統一戰線的幹部經常遭到忽略，或被交付不切實際的任務（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285-292）。儘管李維漢的允諾從未兌現，這些問題或許是促使其決心交付民主黨派自主管理的關鍵（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285-292）。

對民主黨派而言，在統戰部管控黨員資格、黨派發展、黨員職業與地理分布限制的背景下，元氣大傷。民盟的章伯鈞和羅隆基均表示，對未能建構獨立思考或實施特定做法的無能，深感挫敗。根據國民黨，一股無力感瀰漫在各民主黨派之間，萌生出消極為「客」的心態（Hilton 1980, 507）。

這股無力感源自於民主黨派在實際參與或貢獻政府的迅速落寞。遭到奉行分離主義的共產黨官員的忽略、漠視或刻意排擠，民主黨派被拒於門外，即便是如黃炎培的民盟大老、輕工業部部長，也曾在索取文件時，被自家部門因安全緣由而拒絕碰壁（Hilton 1980, 504）。這股分離主義在各階層隨處可見，而往往由不適任的共產黨黨員占盡優勢，除非需要有人背黑鍋，民主黨派通常占不到任何便宜職務。這

些問題弊端甚至延伸至人大與政協，當民主黨派討論重大議題之際，共產黨早已做好決策而充耳不聞。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王昆侖表示，「民主黨派僅是共產黨顏面上的眉毛」—單純的裝飾罷了（MacFarquhar 1960, 42）。

當毛澤東開放對黨的批判時，民主黨派內部對共產黨積累的厭惡，卻使之迎來悲慘的後果。儲安平身為重要的民主黨派領袖，也是光明日報的編輯—該刊物是民主黨派和其他異議人士的發洩管道。毛澤東在面對儲安平發表的文章，和統一戰線論壇所針對共產黨和其本人遞增的負評，並非很是滋味。儘管被施以壓力，民主黨派仍不改其本色，毛澤東因而宣布民主黨派的批評言論乃仇敵之舉，發起反右翼運動回應之，鎖定民主黨派領袖及其黨員，重啟激烈的階級鬥爭（Groot 2004）。

縱使民主黨派曾有短暫的復甦之勢—在毛澤東大躍進的災難性失敗後，第二次雙百運動的 1961 年和 1964 年之間—民主黨派變得無關緊要，且在文化大革命早期遭到正式解散。直至毛澤東死後，改革開放初期，民主黨派才又重新崛起。

我們事後可以看見植根在統合主義結構內的中介體，以及散布在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有效代表權和代理人的扭曲，不但是固有也是故意的。尤其是意識形態的灌輸，說明所有訊息與想法皆須被校準，迎合共產黨宗旨，並同時改造中產階級的民主黨派成員和其支持者，使之成為支持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無產階級，以便打造更為同質、沒有階層之分的社會，國家與利益被清楚調和一致。在這個語境中，藉由遴選其領導階層而加諸在民主黨派上的束縛、共產黨與進步派的結盟、因倚靠統戰部而被施加的財務限制，以及一般民主黨派成員幾乎無關緊要的本質，皆使黨國關係越發茁壯，而民主黨派與其支持者的相對重要性減少。同時，民主黨派亦為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作為必要的社會主義改造手段，付出極大的代價。

肆、1980年代民主黨派的復甦

儘管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並未因毛澤東死後遭到捨棄，階級鬥爭的政治、身體、心理暴力和焦躁卻結束了。統一戰線被迅速檢視，由暫時重返的新民主取而代之，而市場與私人企業部門再度被允許，並開放外資，強調國防、科學技術、工業、農業的四個現代化的專業支持。

即便共產黨堅持反右翼運動無誤，東山再起的民主黨派的工作之一，即是協助平反右翼分子。在反右翼運動中，有 570,000 人因為被劃上右翼標籤而被移轉，他們的技能、人脈、學識因而全被糟蹋。民主黨派的復甦象徵著平反，藉民主黨派的

努力，毛澤東思想主義所滋生的教育系統問題得到部分改善。民主黨派建議改革，發展付費的輔助學校系統，為缺乏技能與知識的人提供教育訓練。這項平反工作增加對知識分子的支持，他們是被毛澤東思想主義迫害最深的團體，而民盟和民主促進會的教育從業成員尤其在這項工作上特別重要。

民主建國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曾與鄧小平會談，鄧小平對振興股票市場的建言表示感激，而許多建國會成員在新組織裡表現活躍，如中國中信銀行（CITIC）。另外，針對 1950 年代因徵收企業而對資產階級所虧欠的款項，也已在投資新企業的共識上發放歸還。

1982 年，胡耀邦承諾政府將給非共產黨人士重要的職務安排，並將職務安排的目標訂為 5000 人。終於，民主黨派被憲法綱領所承認，其組成被重新檢視，亦被鼓勵擴大成長，這些對他們給需要的人諮商、減輕貧窮和提供技術的新任務，如虎添翼。

1988 年到 1989 年間，民主黨派的地位得到不少改善，會員數目來到 338,000 人。許多成員利用自身的專業，得到重視並成功抵制某些共產黨的計畫，最知名的莫過於迫使三峽大壩暫時停工，有些成員的出版刊物甚至成為改革提案的傳聲筒。最戲劇化的是，在共產黨領導如趙紫陽應許民主黨派更為重要的角色後，民主黨派備受鼓舞，甚至在 1989 年五月和六月走上北京街頭，支持學生抗議。同時，共產黨向外積極尋求民主黨派的專業協助，欲解決改革開放所衍生的問題，特別是通貨膨脹。

意料之中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共產黨對學生的鎮壓，激怒了民主黨派，尤其是那些對 1950 年代心有餘悸的人士。1990 年由於懲戒手段的廢除，許多曾被組織整肅的成員，加入抗議行動。政治系統的逐漸開放，讓民主黨派的願望與牢騷得以藉另一扇窗抒發。不過，民主黨派憂心各黨同質性太高，欲發展個別鮮明的特色，有些人士倡議獨立的黨旗與黨徽，並劃分專有的政治平臺。然而諸多對民主黨派的抱怨，始終圍繞在民主黨派成員侷限性的本質、嚴重的內部爭鬥，以及領導階層時常未跟成員協商，便擅自公開表達立場的事實。一位成員對民主黨派的問題做出總結：「一人做事，有三人反對；兩人調查，十人有散播謠言」（任濤 1987）。

民主黨派和統戰部的關係亦有嫌隙，被指派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年輕幹部，因為缺乏學識與相關經驗，對調和自身任務與政治素養感到困難，導致階級鬥爭惡化。更糟的是，鑒於對共產黨挹注經費的倚賴，民主黨派一再面臨財務問題。

共產黨政策的恣意改變，往往使民主黨派深受影響，因此，民主黨派傾向支持任何強化其合法地位，並提升自身在政協地位的政策。與共產黨交涉時，民主黨

派的主要優勢大部分落於本身技術專業的權威，這般現象在政協清晰可見。然而在 1980 年代，民主黨派參與政協的情形與 1950 年代無異，基本上屬虛應故事。代表團以個人名義出席，會議議程被延誤發放，又會議安排規模太大導致安排給各代表的時間短暫，根本無法在議程事項上發揮影響力。

在鎮壓學生運動之後，令人注目的是由江澤民所領導之共產黨，允諾在國家事務上，授予民主黨派與其他統一戰線團體更多重要職務。1990 年代早期，存在一股對民主黨派的樂觀看法，認為其條件將獲得改善，尤其在政策發展上有更大的話語權。然而，幾乎肯定的是中國在歷經短暫國際孤立和經濟反彈後，共產黨對於遵守其在 1989 年 12 月《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所暗示的承諾（Beijing Review 1990），便興致缺缺。可見危機過後，共產黨又故態復萌。

伍、21 世紀的民主黨派

現今的中國與九十年代的中國大相逕庭，更遑論與五十年代的中國相比。中國的社經狀況越發複雜，統戰部謀求團結中國所有階層之挑戰亦然，而民主黨派被要求協助反映社會日益繁複之事實。現今民主黨派的全部成員接近一百萬人，2007 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民主同盟有 184,480 名會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有 82,000 名會員、中國民主建國會 103,000 名會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有 109,000 名會員、中國農工民主黨有 102,000 名會員、致公黨有 30,000 名會員、九三學社有 105,000 名會員、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有 2,600 名會員（梅清海 2008, 67-71）。與 1997 年 466,000 名的全部會員人數相比，該數字其實未見實質的雙倍成長（Groot 2004, 204）。

共產黨要求每一個民主黨派皆須恪守本分：「團結、重建、體現、調和社會並鞏固共產黨政權，建立和諧社會，提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游洛屏 2010, 175）。作為「新時代、新世紀統一戰線」的一部分，民主黨派必須：

1. 促進經濟發展；
2. 走向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3. 促進國家統一和社會和諧；
4. 保證香港與澳門之長期繁榮與促進兩岸關係實質發展；
5. 鞏固黨的階層基數並擴大群眾基礎；

6. 努力創造正向的國際與區域環境。

而民主黨派作為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手段，一覽無疑。

試圖評析統戰部在任一領域的影響是十分困難的，而釐清其對民主黨派所扮演之角色更甚。2009 年任命非共產黨黨員的數據顯示，含處以上單位的職務占 32,000 名，其中檢察院（Procurate）的高層職務占 19 名。另外，在省級部門有 31 名人大代表、29 名副市長或副市級主席（Groot 2004, 204）。在非共產黨人士的職務任命中，最具顯著意義的是陳竺被任命為衛生部部長，而王剛作為民主黨派人士，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國內共有 17,000 名民主黨派人士被任命為特別調查員，其中有 87 位隸屬國家部門、近 1,000 名被安排為政府顧問、1,600 名被安排至中央或其直屬的文化歷史研究協會。這些統一戰線的職務安排屬於事務官，並非政務官（Groot 2004, 180），與黨職安排有著天壤之別，再度突顯民主黨派的弱勢。雖然這些職務安排數目超過胡耀邦 5,000 名的目標，在整體中國的官僚體制下仍屬九牛一毛，光是 2005 年處級人員就共有 620,000 名（Anyang 2006；中國共產黨新聞 2006）。

政協仍是民主黨派輸出專業的主要管道。近期文獻著眼於政協一路自統一戰線，發展成「中國政治制度重要的一部分」（胡筱秀 2010, 154-157），企圖提升該制度之地位、影響力和合法性。自 1993 年，在政協給中央政府近兩百項重大提案的基礎上，提升政協地位的努力獲得了回報（游洛屏 2010, 180），截至 2008 年，中央政府收到 5056 項提案、派出 4738 支調查團、發表 16 個公共意見報告，並委任超過九千項專案予調查員（胡筱秀 2010, 144）。政協深入議題、提出問題和發表建議的重要性，看似逐年攀升。

然而政協的成效卻不彰顯，因為所有的提案取決於共產黨的接受度，否則僅屬建議性質。胡筱秀暗示政協的報告與提案本身，是為反映共產黨強烈關注的議題，然而胡僅列出九項執行成功的提案（胡筱秀 2010, 148）。這或許說明統一戰線實際僅強調 1980 年代，以科技官僚為基礎，反對三峽大壩工程的民主黨派，作為政協成效的重要範例（Groot 2004, 166-169）。同樣地，從政協收到超過 95,000 封書寫遺憾和建議信件的事實中，顯示議題的解決或進展根本無從得知（胡筱秀 2010, 144）。

有關政協問題弊病的言論，有筆者批評許多民主黨派的提案品質惡劣（胡筱秀 2010, 149），而調查民主黨派無法維持良好表現的原因，多方面來說就足以揭露和持續反映自 50 年代至 80 年代間，植根在共產黨一元統合主義結構下的問題是無甚轉變的。民主黨派並非一般為共同目標，自由連結個人的團體，他們是長期監

督的設置—監督外部及內部兩者—是共產黨主導的黨的建設與多元監督的一部分。一項案例研究指出某一城市的民主黨派人士，只有 43% 直接申請職務，其餘均由統戰部推薦、黨內朋友介紹或由民主黨派自行招募。可見這些成員對民主政黨缺乏知識、政治意識不足，加入的動機乃基於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或組織安排的結果（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2008, 505）。對許多人來說，擁有民主黨派的黨籍是擁有自我實現的手段，能夠獲得升遷，或某種程度上為工作單位達成目標。因此，握有黨籍的福利之一，便是在黨內或政協內部相對快速地晉升（劉紅凜 2010）。

理論上，投機分子理應在統戰部指揮的嚴苛篩選制度中剔除，該制度之軟肋在於統戰部對黨的各個級別均設有工作項目。在較低級別中，來自當地政黨的資金往往不足，使招募合格的幹部成為問題，而各自地方單位可能早有計畫，對達到會員目標倍感壓力。然而，這些缺失僅部分說明招募會員的「問題」和其後果。

根據共產黨 / 統一戰線之綱領，民主黨派的會員資格取決於該候選人是否具有特定圈內的影響力、主要團體的代表性、與共產黨合作之能力、以及有效政治協商的能力和水準（梅清海 2008, 47）。基於統一戰線和共產黨的需求轉變—如現今以經濟發展為首要要求—顯示各政黨傾向招募與當前需求最切的專家，或是能推動經濟成長的人士，使各民主黨派侷限在相當狹隘的職業範圍或特定背景。

然而，作為專家和作為職業或社會團體的影響人士並非同一件事，兩者關係微妙，但統戰部對二者的評斷標準不明。雖然普遍認為候選人應該具備主要團體之代表性，但若涉及定義、合適標準以及評量方式時便問題叢生。當然，以統計方法判斷個人是否呈現若干或所有團體的主要特徵是全然可能的，在不盡然需要成員承認其代表性，或在任何政治層面上接受其作為合法代表的情形下，這些個人仍能代表團體。統計方法即便具有科學的準確度，與共產黨當前對科學發展觀的需求看似相輔相成，仍缺乏民主合法性。這樣或多或少帶有隨意獨斷的方式，將具備相同特徵的人集合起來，並不能確保其任何能力或攜手合作的意願。

另一個帶有重要意涵的會員資格條件是與共產黨合作的能力，這項標準隱含 1979 年由鄧小平所揭示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爾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亦被加入鄧小平理論。即便加入民主黨派，成員仍需接受民主黨派以及統一戰線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政治教育；然而，由於不再如 1950 年代被要求澈底改變思想或意識改造，對潛在會員而言，接受政治教育的要求與否儼然已無關緊要了（Groot 1998）。

會員是否願意接受共產黨領導以及其在統一戰線的角色，將影響民主黨派評斷

其政治協商的能力與素質。若質疑共產黨的領導權威，則會員的能力與素質將不備受肯定。一方面，有關政治協商能力的標準暗示對擁有優秀人際關係技能，以及在複雜黨國體系內談判能力的需求，因為那些在職業或學術上享譽盛名的專家不盡然具備這些技能；另一方面，雖然擁有高素質表示符合會員標準，在專業領域受人尊重，但這通常亦被延伸至個人道德層面，尤其涉嫌貪腐之際。鑒於調查貪腐是民主黨派在共產黨、民主黨派共同監督下的重要工作，個人操守亦是重要考量。

這些共產黨所設的標準乃試圖凝聚其政治上可以倚靠的力量，以利獲得調查共產黨內部如敏感紀律和貪腐問題的客觀專業，用以調查弊病、建議政策、檢視法律規範、提供外部專門知識等工作事項。

儘管共產黨的種種設限，民主黨派仍應具備體現並象徵所代表團體之能力。就其在公共議題和意見的調查與報告上，近來文獻形容民主黨派具有「輸送帶」和「橋梁」的功能，隱含其直接、忠實和不經中介的傳遞特質。如果成員擁有所要求的技能和特質，他們將會是民主黨派與效能的來源，而他們對政協、共產黨，以及政府的提案也應該是有益的。再者，鑒於彼此間代表之團體不同，民主黨派也理應具備獨特明確的特質。

然而，雖然有關民主黨派組織性的討論缺少之又少，但是大都勾勒出既相異卻又相似的論述。如同上述所提及的，很多人在未符合標準、又非為成就大我的動機下，加入民主黨派。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當前遍及全國的民主黨派領袖，沒有一位能匹敵其創辦人如費孝通、羅隆基、章伯鈞、張東蓀或梁漱溟的名聲、地位和影響力。

即便歷史和支持者迥異，要找出各民主黨派間真實的不同之處實屬不易。有關民主黨派的研究不斷強調發展各自特色，反映民主黨派的單一性招致批評。更重要的是，許多民主黨派分部的功能彰顯不佳，並飽受組織癱瘓問題（梅清海 2008, 80），如許多既定安排的閱讀文件（reading documents）會議吸引力不再，徒剩茶會性質（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2008, 144）。而諸多出國深造或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的專家，與那些在統一戰線得到重用的人對立，是造成這些專家不重視會員身分的另一項原因（田曉玉 2010, 116-118）。

除了聊天和學習黨精神之外，分部對一般黨員毫無用處。如指導手冊以及其他守則所指示，大部分統戰部的關注落在揀選並訓練領導班子，為將來政府、政協與人大高層儲備領導幹部。這些民主黨派內部派任的職務，無須對會員具影響力，或獲得會員的同意與贊成。對許多一般黨員而言——即便是那些已被派有職務的一對民主黨派的無用論、無權論、形式論習以為常（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2008, 94）。甚至

在政協內部，「說真話越來越困難，因為領導（共產黨）不樂聽，而說謊話惹百姓生氣，唯有說笑話大家都開心。」（游洛屏 2010, 109）

爰此，形式主義作為主要問題是意料之內的事。形式主義消磨民主黨派成員和政協代表的滿腔熱血，打擊所有專家——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所費盡之努力，其報告的接受度或任何結果之反饋，全然由黨國制度斟酌決定。更糟的是，任何成功的榮耀或名譽都是屬於共產黨的，所以民主黨派的提案和建言變得無關緊要，也不足為奇，反倒是代表若相信共產黨想聽什麼或政府想要什麼都一一呈現。而另一項招致批評的不利因素，是政府提名民主黨派人士，參與協助維護政府利益的工作。

縱使近來對於統一戰線缺失的公開討論逐漸攀升，但如同此處所引證的，對缺失的成因並未有深入分析。即便承認政府政策、法律以及制度需要被檢視，當代的問題和 1950 年代所面臨的難題始終如出一轍，而常見的解決提案包括：揀選適任的民主黨員及領導階層、提高會員素質、道德勸誡（如鼓勵會員勇於承擔責任）、呼籲利他精神與愛國主義、政治教育、黨的建設，而最重要的是加強黨的領導。居於二線（sidelined）的民主黨派領袖看似對其自身的成員，並未握有太大的影響。

民主黨派和政協的缺失將共產黨一元統合主義形式的侷限與其導致的後果展示得一覽無遺。因為其代表的基礎過於偏頗，任何民主黨派（有限）的成功，無法確切體現或代表其目標群體，更無法扮演準確的「輸送帶」，傳遞支持者意見或公共言論。另外，如果其支持者不滿意共產黨，則接受共產黨政治要求的後果，即是加入民主黨派將會加深黨員和支持者之間的鴻溝。畢竟，後者對於民主黨派的會員標準或領導選擇是毫無話語權的，任何成功代表選民意見的案例，並非是基於共產黨廣泛且深入的控制，而是控制下單純的偶然事件。全部經承認的七十一萬名民主黨派人數僅占共產黨七千萬名黨員的百分之一，兩者的權力不對稱是十分龐大的。

那些對制度和其潛力仍抱有希望的，主要則訴求更多法律、程序、和規範化，以期改善效能，但這些方法無法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最近一項有關改善效能的努力，是 2005 年基於 1989 年促進多黨合作宣言的指示，該指示列舉多種協商形式，並增加具體說明（人民日報 2005）。然而，越多的規範則顯示問題的根本依然無從改善。

陸、對宗教人士和少數族群的隱含

共產黨在數量稀少卻影響重大的宗教團體和少數族群上投資不少心血，兩者皆

在統一戰線有重要的代表團體，並時常在人大與政協披著民族和宗教的道義外衣，刻意招搖。關於兩者在統一戰線的討論，與關於民主黨派的討論相異，「因為只要涉及兩者之一的事，就沒有小事這回事」（梅清海 2008, 8）；也就是說，即便是關乎其一小問題皆有可能升級發展為大危機。在中國有 55 個少數族群，占全中國人口 8.5%，共有一億五百萬人，大部分居住在邊境地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05）。另外，中國五大信仰尚有數百萬名的佛教、道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和回教信徒—有些人是因為民族傳統而接受該宗教信仰。這些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是外部人權組織的主要觀察對象。

如果統一戰線從這些族群所得到的數據，能提供關於其代表群體即時準確的訊息，理論上便能避免爭執爆發。從共產黨控制民主黨派的教訓中，透露揀選能夠真實反映民意的代表是極其不易的，就算真的有一時之選，後果也有可能因為共產黨的控制，而侷限傳遞確切建議和真實意見的能力。

在宗教領袖代表方面，首要標準要求「愛國、積極，並對國土和國家統一與發展有所貢獻」（梅清海 2008, 132），他們必須「維護社會主義、維護共產黨領導並尊重法律」（梅清海 2008, 132）。在面臨信仰人數攀升，以及共產黨所畏懼的外來惡意勢力操弄宗教之際，三萬名中國宗教職業人士被要求接受政治教育（基於 Carsten Vala 檢視宗教—國家關係的延伸解讀）。許多宗教領袖因為缺乏信仰基礎，統一戰線將加緊草根教育，使民眾信任法律，並建立鄉村責任制度的這些努力，視為嚴重削弱領袖權威的解套措施（Wang 2008, 49）。

誠然，為滿足物質需求，支持共產黨，並接受政治教育，宣傳黨的政策宗教領袖，若作為統一戰線之代表，將會使部分民眾對其基於物質條件考量，喪失其宗教精神，導致與信眾產生社會落差的認知加深。在共產黨的政策試圖塑造宗教信仰與習俗，以迎合黨的目標之際，又或如某一位筆者所言，共產黨「改變任何無法滿足社會進步的內容」（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 2010, 30）之際，上述認知將更為嚴重。倘若人民以恢復或接受信仰，作為不滿共產黨政策或舉措之回應，則任何宗教領袖的遴選將引人憤慨，而同樣的現實亦印證在少數民族身上。

鑒於中國少數族群在國土邊界的重要性，以及占有對協助國家統一與穩定起關鍵作用的全國 9% 人口，尤其族群、宗教兩者有時相互牽涉，統一戰線將重點工作擺放在前述兩者便可想而知。與民主黨派的指示相比，統一戰線《黨的基層統一戰線工作手冊》的內容出現突兀轉變，前者強調為政協和人大挑選代表，後者則是為黨和政府揀選合適幹部，而剛好引人詬病的是，這些幹部恰恰是黨執行政策的骨幹和「傳送帶」。

代議團體雖然重要，但地位卻相對次要，而揀選代表是相當敏感的議題。有時民主黨派會釋出公眾異議，但此現象卻從未在民族代表團體（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alities）中發生，通常該團體的有關決策由上層人決定，且一貫「團結、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政策，仍然是確保團體穩固的核心（全國統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審委員會 2000, 126-127）。作為幹部和代表的主要原則是「三個離不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全國統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審委員會 2000, 132）。代表受到妥善的政治呵護，更在統一戰線所揭示的原則下，細心照料一切所需（全國統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審委員會 2000, 126-127）。與其他團體相比，在揀選民族團體代表方面，愛國主義被定義為全力支持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因此相對重要。在共產黨和政府內部有超過 230,000 名代表少數民族的幹部，表示相較於民主黨派，民族團體的地位更為重要（北京市委統戰部研究室 1998, 87）。

相比民主黨派，統一戰線與少數民族的問題更為明顯。倘若少數民族遭遇歧視，導致身分認同的混淆，則將引發對共產黨—漢族統治架構的反彈（Hasmath 2010），期待更多自主，要求家鄉實施實質自治。這些被自動定義為敵我矛盾，而非族群矛盾。在當前的狀況下，尚無法將上述身分面臨混淆的人民或團體納入統一戰線，因為基本的先決條件並不存在。

雖然清楚認知統一戰線問題的主要層面，但對問題的解釋仍相對抽象（林尚立、肖存良 2010, 149-182），且尚需釐清。如果少數民族幹部遵從共產黨指揮，說明他們極有可能迅速被反對黨的人疏遠，因而降低他們作為黨與人民之間「傳送帶」傳遞民意的能力，即是中介結構削弱了訊息的準確度。如此，成為黨工或代表便表示傳達民意的效能將自動減弱。這些問題或許並非是最近叛亂背後的成因，但極有可能與共產黨無法預期，或阻止問題發生的能力有關。

柒、結論

近期有關統一戰線理論或研究的主要動機，尤其是研究統一戰線表面上在政協參與政府的角色，是為證明中國建立其特有的代議民主形式。宣傳中國代議民主作為西方之民主替代，有些人盼望著終結西方對民主與人權之霸權論述（梅清海 2008, 133）。然而，數名中國海外人士認為，即便人大制度並非共產黨統治的橡皮圖章，政協和統一戰線的願景仍是窒礙難行。因為缺乏能夠證明這套協商制度成

功的事實（並看清政協與人大作為共產黨的工具的事實），說明所謂的民主黨派和少數民族團體參與協商，充其量屬形式、象徵性質而非實質。

雖然許多研究人士體認此一問題，但他們的解決之道，如挑選勇於負責的代表、政治教育、黨的建設甚至是共產黨領導，惡化了共產黨統合主義結構的內生問題。共產黨對民主黨派在各個層面上的控制，從會員標準、指派領導階層、要求服從、仰賴外來挹注等等，均使民主黨派不得不向共產黨千依百順，缺乏自主，無法作為一個真正的政黨。所有施加在民主政黨的控制，全然是為了防止其成為有獨立意識、組織整合的政黨，以杜絕任何潛在反對。因為民主黨派所有的行動與晉升取決於共產黨的需求，所以民主黨派的黨籍變得可有可無，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 2005 年萬鋼空降到致公黨，成為 30 年以來第一個被稱做「非共產黨領導」的政府部門首長。萬鋼一路提拔的過程說明其本身極有可能是共產黨黨員，暗示無論民主黨派領袖多麼認真工作，很有可能在升遷時被共產黨黨員取代，而如此情形只是讓民主黨派領袖感到徒勞喪志。

40 年代的統一戰線有能力也確實吸收了一些固執的人—有些甚至具有反共產黨傾向—但在 1949 年 10 月後便不再吸收異己了。自 1950 年起，共產黨以排除異議為目標，所有的政策皆是會以會員改造作為宣傳典範，對於準確反映民意的需求極小，即便偶而有領導高層坦率直言，讓民主黨派暫時享有叛逆，民主黨派同質化的傾向仍不可逆轉。

統一戰線的成員皆在共產黨的指示下發展，導致統一戰線的成員和共產黨間趨於同化。然而，雖然會員組成趨同，卻並未趨於團結，因為會員仍缺乏團結一致的理由。另外，共產黨控制統一戰線，深化宗教領袖和少數民族代表與支持者間的鴻溝，導致即使支持者向上傳達不滿的能力，儼然弱於共產黨向下宣導指令的力道，現今可能因為這道鴻溝，使共產黨的宣導指令不被全盤接受。

目前統一戰線作為共產黨宣傳工具的表現仍屬尚可。雖然遴選代表的制度產生諸多如到底是誰代表誰的疑問，但這套制度仍提供共產黨，向外聲稱具備主要團體代表性，發展民主的基礎。除此之外，共產黨看似滿足於現況，不願採取任何反映西方思想的改變，因為改變如同宣告共產黨的政治失利，故寧可花錢買通可能成為反對派的個人。因此，就共產黨而言，其失能的統合主義仍還算差強人意。

* * *

A Self-Defeating Secret Weapon? The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f Corporatism on United Front Work.

Gerry Groot

Senior Lecturer in Chinese Studie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bstract

Many people, including many Chinese, think that united front work is something that finished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d armed force to defeat the Guomindang (GMD) in 1949. In reality, united front work was always much more than communist-nationalist cooperation and included many political groups,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the like. It also included a number of min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MPGs) some of which came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CP united front strategies aimed at isolating the GMD.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1950-56) these so-called democratic parties, reorganized by the CCP along corporatist line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helping and smoothing the dramatic changes. Resentments about problems of CCP influence over the MPGs were aired in the Hundred Flowers movement of 1956/57 but as China was moving towards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class, these problems were not important. The MPGs also helped support the economic reforms which began in the late 1970s. Now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layered with ever more socio-economic groups,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UFD) and the parties are being asked to represent and unite with these new groups to secure CCP leadership and promote both development and un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1950s still exist but are now more likely to be detrimental in that the CCP's excessive controls on selection do not allow for an accurate enough refl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new social groups that the MPGs are now also expected to represent.

Extrapolating these systemic problems may also help to explain shortcomings in the UFD's ability to prevent unrest among other key groups such as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Keywords: United Front Work, Corporatism, Systemic Limitations,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參考文獻

- 人民日報，2005，〈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02月18日。People's Daily. 2005. "Guanyu jinyibu jiaqiang Zhongguo Gongchandang lingdaode duodang hezuo he Zhengzhi xieshang zhidu jianshe de yijian"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ebruary 18.
-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2010，《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Zhongyang shehui zhuyi xueyuan zhongguo zhengdang zhidu yanjiu zhongxin. 2010. *Zhongguo tese zhengdang zhidu lilun yanjiu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Beijing: Shishi chubanshe.
-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編，2008，《學員論文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Zhongyang shehui zhuyi xueyuan (Ed). 2008. *Xue yuan lunwen xuan [Selected Works of Institute Member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1988，《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tongzhanbu yanjiushi (ed). 1988. *Lici quanguo tongzhan gongzuo huiyi gaikuang he wenzhai [Selections and Summaries from National United Front Work Conferences]*. Beijing: Zhongguo wenhua chubanshe.
-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員會編，1991，《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Zhongguo minzhu tongmeng zhongyang wenshi weiyuanwei (ed). 1991. *Zhongguo minzhu tongmeng lishi wenzhai 1949~1989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 Beijing: Wenwu Chubanshe.
- 中國共產黨新聞，2006，〈中組部：中共黨員總數已達到7080萬人〉，<http://cpc.people.com.cn/GB/47816/4154027.html>，查閱時間：2010/12/26。Zhongguo gongchandang xinwen. 2006. "Zhongzubu: zhonggong dangyuan zongshu yida 7080 wanren"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The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Reached 70.80 Million]. (Accessed on December 26, 2010)
- 北京市委統戰部研究室編，1998，《統一戰線工作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Beijing shi wei tongzhan bu yanjiushi (ed). 1998. *Tongyi zhanxian gongzuo shouce [United Front Work Handbook]*. Beijing: Guangming Ribao Chubanshe.
- 左憲民、李賀林編，2008，《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Zuo, Xian-min, and Helin Li (eds). 2008. *Zhongguo tese xieshang minshu yanjiu [The Studie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Zhonggong

zhongyan dangxiao chubanshe.

- 田曉玉，2010，《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若干思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Tian, Xiao-yu. 2010. *Tuijin shehuizhuyi minzhu zhengzhi jianshe the ruogan sikao [Some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Beijing: Zhishi Chanquan Chubanshe.
- 任濤，1987，〈社會主義民主和統一戰線〉，《群言》，3：12-13, 17。Ren, Tao. 1987. “Shehui zhuyi minzhu he tongyi zhanxia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United Front]. *Qunyan*, 3：12-13, 17.
- 全國統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審委員會編，2000，《中國統一戰線簡明教程》，北京：華文出版社。Quanguo tongyi zhanxian ganbu peixun jiaocai bianshen weiyuanhui (eds). 2000. *Zhongguo tongyi zhanxian jianming jiaocheng [Concise Textbook of Chinese United Front Work]*. Beijing: Huawen Chubanshe.
- 林尚立、肖存良編，2010，《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前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Lin, Shang-li, and Cun-liang Xiao (eds). 2010. *Tongyi zhanxian lilun yu shijian qianyan [United front Theory and Practice Frontlin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胡筱秀，2010，《人民政協制度功能變遷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Hu, Xiaoxiu. 2010. *Renmin Zhengxie zhidu gongneng bianqian yanjiu [Research into Functional Changes in the CPPCC System]*.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梅清海編，2008，《黨的基層統一戰線：工作手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Mei, Qing-hai (ed). 2008. *Dang de jiceng tongyi zhanxian: Gongzuo shouce [Handbook of Grassroots Party United Front Work]*. Beijing: Renmin Ribao Chubanshe.
- 游洛屏，2010，《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理論體系》，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You, Luo-ping. 2010. *Woguo duodang hezuo zhiduo lilun tixi [China's Syste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Beijing: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 劉紅凜，2010，《協同與共贏：論當代中國的多黨合作與執政能力建設》，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Liu, Hong-lin. 2010. *Xietong yu Gongying: lun dangdai Zhongguo de duodang hezuo yu zhizheng nengli jianshe [Cooperating and Winning Together: Contemporary China'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Governance Capability]*. Nanchang: Jiangxi Renmin Chubanshe.
- Anyang, X. 2006. “National Authorities above the County Level to Reach 10.4 Million Women Cadres.” <http://www.ayxdj.gov.cn/ReadNews.asp?NewsID=9771> (December 26, 2010).
- Beijing Review. 1990. “Guidelines for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Multi-Party

- Cooper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ch 5-11.
- Elleman, Bruce A. 1995.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21 (4): 450-480.
- Groot, Gerry. 1998. “‘Petrol stations’?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s Institutes of Socialism,” *Issues and Studies*, 34 (5): 22-51.
- Groot, Gerry. 2004. *Managing Transi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Work, Corporatism and Hegemony*.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 Hasmath, Reza. 201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nor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Canada*. NY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Hinton, Harold C. 198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Survey 1949~1979*.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 Hu, Sheng. 1994.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Isaacs, Harold. 1938.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Secker & Warburg.
- MacFarquhar, Roderick,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1989.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MacFarquhar, Roderick. 1960. *China Under Mao*. London: Atlantic Books.
- Mao, Zedong. 1967[1939]. “Introducing the Communist.” In Tse-Tung Mao, ed.,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ume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05. *Tabulation on Nationalities of 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Schmitter, Philippe C.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redrick B. Pike and Thomas, ed., *Stritch The New Corporatism: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Lberian World*.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 Schmitter, Philippe C. 1979. “Still in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G. Lehmbruch, eds., *Trends Towards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and Policy Making*. NY: Sage.
- Van den Ven, Hans J. 1991.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 Slyke, Lyman P. 1967.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Z. 2008. "What Kind of Christianity Do We Hope For?" *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 21: 94-101.